

## 梁振雄, 伊莉·凯依莎·拉汉 (Ili Kaiyisah Rahan) : 多元社区的管理模式转变

梁振雄 / 伊莉·凯依莎·拉汉 (Ili Kaiyisah Rahan)

联合早报, 2017年12月4日

我们常常听管理者说, 机构内部的多元化拥有很多优点, 例如一个更多元的劳动队伍往往更有效率, 更能够解决问题, 同时能激发更多的创意。然而, 如果多元化的是居住社区, 效果却是好坏参半。

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观察了社区的多元性与社会资本, 以及犯罪率之间的关系。比方说, 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Putnam) 曾就多元种族如何给社会资本、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以及他们为共同目标努力的意愿带来负面影响, 进行著述。

社会学家约翰·希普 (John Hipp) 2007年在美国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显示, 即使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得到控制, 社区的种族越多元, 犯罪率就越高。这意味着, 种族越混杂的社区, 社会联结越薄弱, 彼此的信任感也越低, 导致有关社区的罪案增加。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 一个更多元的社区并不意味着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这仅仅是指拥有相同背景的人较少。

另一方面, 加拿大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社区的多元化与社会联结的削弱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在英国, 研究人员仍旧在为究竟是种族的多元性, 还是社会经济因素, 会对一个社区里的社会网络造成更大的侵蚀作用而争论不休。在亚洲, 尽管有一些关于工作场所多元性的研究, 但针对社区多元性的影响的调查却寥寥无几。

今年7月, 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社会研究室 (IPS Social Lab) 使用公开的政府数据, 来考察多元社区和不同地区的犯罪率是否有任何关联。我们发现, 在那些家庭结构、住宅类型和租户数目较为多样性的新加坡地区, 发生了较多的罪案。

有趣的是, 我们发现多元族群与犯罪率并无关系。也许有人会问, 既然确保全新加坡的多元族群得配合国家的多样性, 是新加坡政府的既定政策, 本地的种族多元性是否存在极大的差异, 就如英美所可能同样面对的情形。答案或许就在新加坡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 在组屋区实行的居民种族比例政策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的成果上。至于新加坡的研究结果与欧美相比, 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异, 那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进行探讨。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 我们以市区重建局所划分的55个规划区中的28个作为研究对象。像双溪加株、东陵和先驱等规划区因人口密度低,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分析出现偏差, 因此就被排除在外。

利用统计局根据2015年进行的综合家庭调查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所整理出来的数据, 我们在每个规划区使用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指标来进行研究, 这包括收入、种族、婚姻状况、住宅类型、家庭结构、在家使用的语言和租赁情况。我们使用社会学家经常用来衡量异质性 (heterogeneity) 的布劳指数 (Blau Index), 来计算每个规划区中, 每一种数据的多元性程度。

例如, 一个因住宅类型多样化而得到高布劳指数的地区, 就意味同个社区有着各种各样的私人房屋, 以及各种不同屋型的政府组屋。反之, 低布劳指数的住宅类型, 则表示同个地区的住屋

类型非常相似。然后，我们将布劳指数同 2015 年的总体犯罪率（在新加坡的每 10 万人）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几点。与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相似，那些居民在社会经济潜力（比如，各类型家庭的不同收入水平）和家庭背景（比如，单身、情侣和单亲的不同类型家庭）更为多样性的新加坡社区，犯罪率往往较高。

### 种族同犯罪率无关

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和家庭背景的邻居，彼此的社会联结比较薄弱，这转而造成他们没有互相照应和积极为社区谋福祉。这个情况类似帕特南和希普所描绘的社会图像。

另一方面，与欧美城市普遍观察到的不同，新加坡的种族多元性与罪案并无关系。种族，而不是社会经济差异（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与罪案没有密切的关联，显示就住宅类型和家庭背景而言，三个种族的内部差异很大。

必须说明的是，社区罪案多并非意味着居民就是犯罪者，他们也可能成为受害者。最重要的是，这些社区要如何促进互信和培养更强的社区精神，以防止罪案和其他反社会行为。

关于多元化，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企业界吸取一些经验。如果异质性能够产生更坚韧和更有生产力的工作文化，我们也许应该善用多元社区来为当地人谋福祉。

例如，在地方层面上，居民与社会企业可以制定符合社区需求，以及促进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群体居民之间的信任的计划。基于维护多元社区里，居民之间的社会凝聚力的需要，他们可以向社区发展理事会申请种子资金或经费。

在国家层面，如果学生和选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比全国平均水平更为多元，我们的学校或市镇理事会是是否可得到更多的运作资金？额外的拨款可以用来展开加强公民参与，并鼓励参加地方活动的计划，从而培养睦邻友好的精神，这将有助于减少地方的罪案。

为多元人口制订政策对新加坡来说并不新鲜，多元文化也让其受益匪浅。随着全球经济波动和关于组建家庭的社会价值观变化，多元性将会增加。

究竟这些多元性会是在哪些方面，尤其是它们在国家 and 社区的层面上，会对新加坡的社会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现在是时候细想了。

作者梁振雄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政策研究院社会研究室

（IPS Social Lab）主管

伊莉·凯依莎·拉汉

（Ili Kaiyisah Rahan）近期毕业于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本文依据她今年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

社会研究室担任实习生时的研究成果写成